

襄樊战役

陈大森 著

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

襄樊战役

陈大森 著

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襄樊战役 / 陈大森著 .-- 武汉 :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, 2015.8
ISBN 978-7-5352-6967-6

I . ①襄 … II . ①陈 … III . ①襄樊战役 — 史料 IV . E29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3998 号

作 者：陈大森

责任编辑：秋 子

出 品：襄阳智城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：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2 楼

印 刷：襄阳鑫汉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45mm × 210mm 32 开

字 数：310 千字

印 张：16

印 次：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：4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修改的 中共中央贺襄樊战役胜利的电文手迹

中共中央贺襄樊战役胜利的电文

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粟裕、李先念、
邓子恢、宋任穷、张际春、王宏坤诸同志
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：

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，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，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。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，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，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，帮助甚大。尤其是活捉康泽，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。尚望继续努力，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！

中共中央委员会
1948年7月23日

中原解放区桐柏军区第三专署、军分区 布告

(联字第 号)

我军相继攻克老河口、谷城县城，全歼守敌，解放汉水两岸广大地区，久被蒋匪统治的人民获得解放。望我区人民与我军共同努力，打倒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，肃清蒋匪残余，安定社会秩序，特昭示如下：

一、联合与团结一切反美反蒋的社会阶层，组成统一战线，打倒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。

二、实行合理负担，减租减息，调剂粮食种子的社会政策，取消苛捐杂税，改善人民生活。

三、对蒋党蒋政府人员政策，有功者受奖，胁从不问，欢迎悔过自新，立功赎罪，回家安业，不追既往，对首恶并继续作恶者必加严办。

四、准许各保甲长照常办公，维持社会秩序，为人民服务，协助本军作战。

五、对蒋伪军政策是：（一）带队来归者改编；（二）

带枪来归者有奖；（三）战场放下武器者不杀并优待；（四）逃亡回家者容许来归或俘虏自愿回家者酌情发给路费，遣送回家。

六、欢迎反蒋反美的青年学生及知识份子参加解放区各种建设事业。

七、各学校工厂作坊商店照常开课、开工、营业，概加保护，严禁破坏。

八、严禁打人捆人罚人，非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任何人。

此布

兼 专 员 李定灼	副 专 员 郭涤生
司 令 员 张廷发	政 治 委 员 李定灼
副 政 委 吴 罡	政 治 主 任 訾修林
副 主 任 王大华	参 谋 长 王明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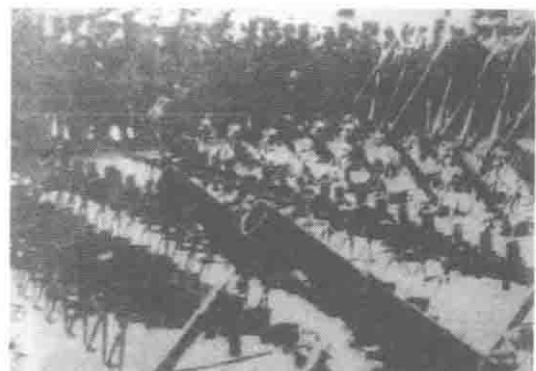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日



刘邓首长合影。



康泽在被押解我军后方的途中。



缴获的部分武器。



我攻山部队运动接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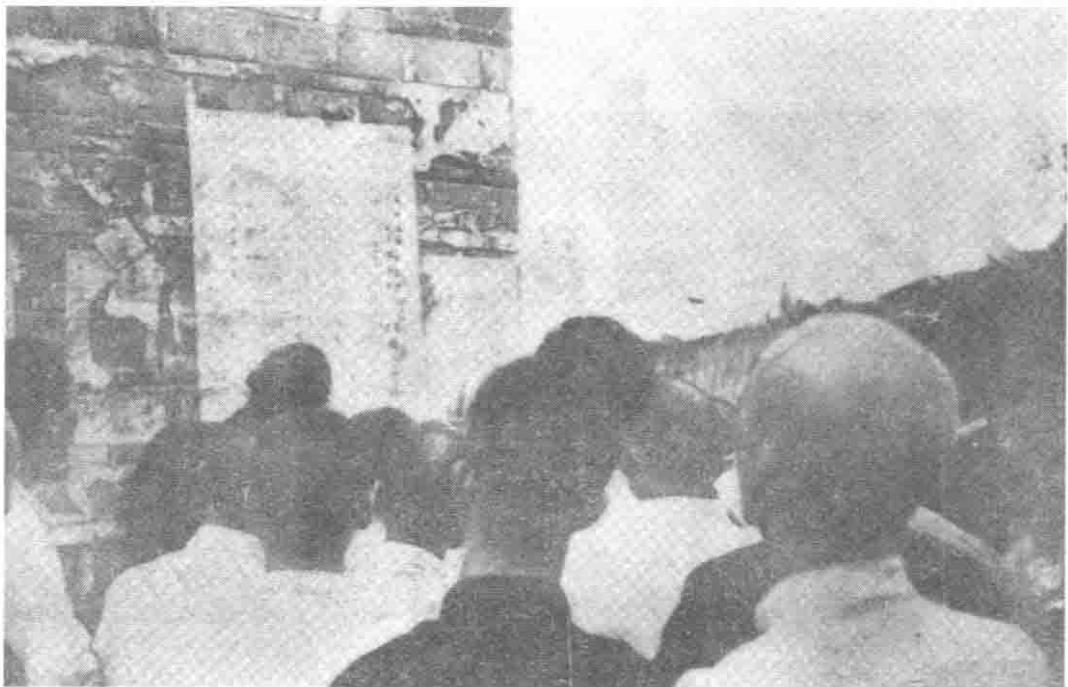


康泽被俘后关押地，后被中原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张轩、警卫团副政委朱汉雄于9月18日押往华北。



我军前哨部队搜索光化伪县政府。

七月十五日解放襄阳图：襄
阳伪县政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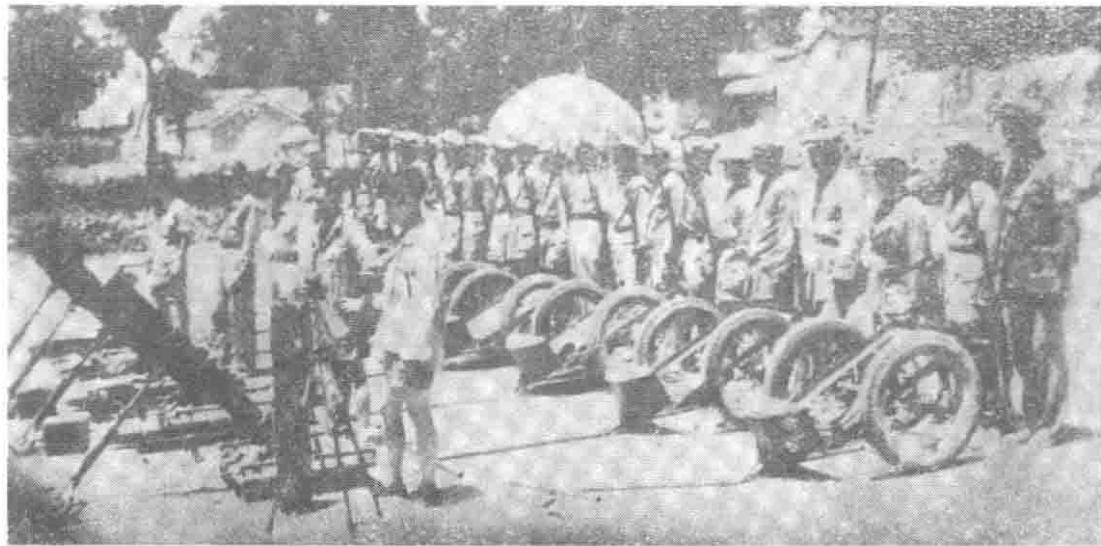


老河口市民看我保护城市的布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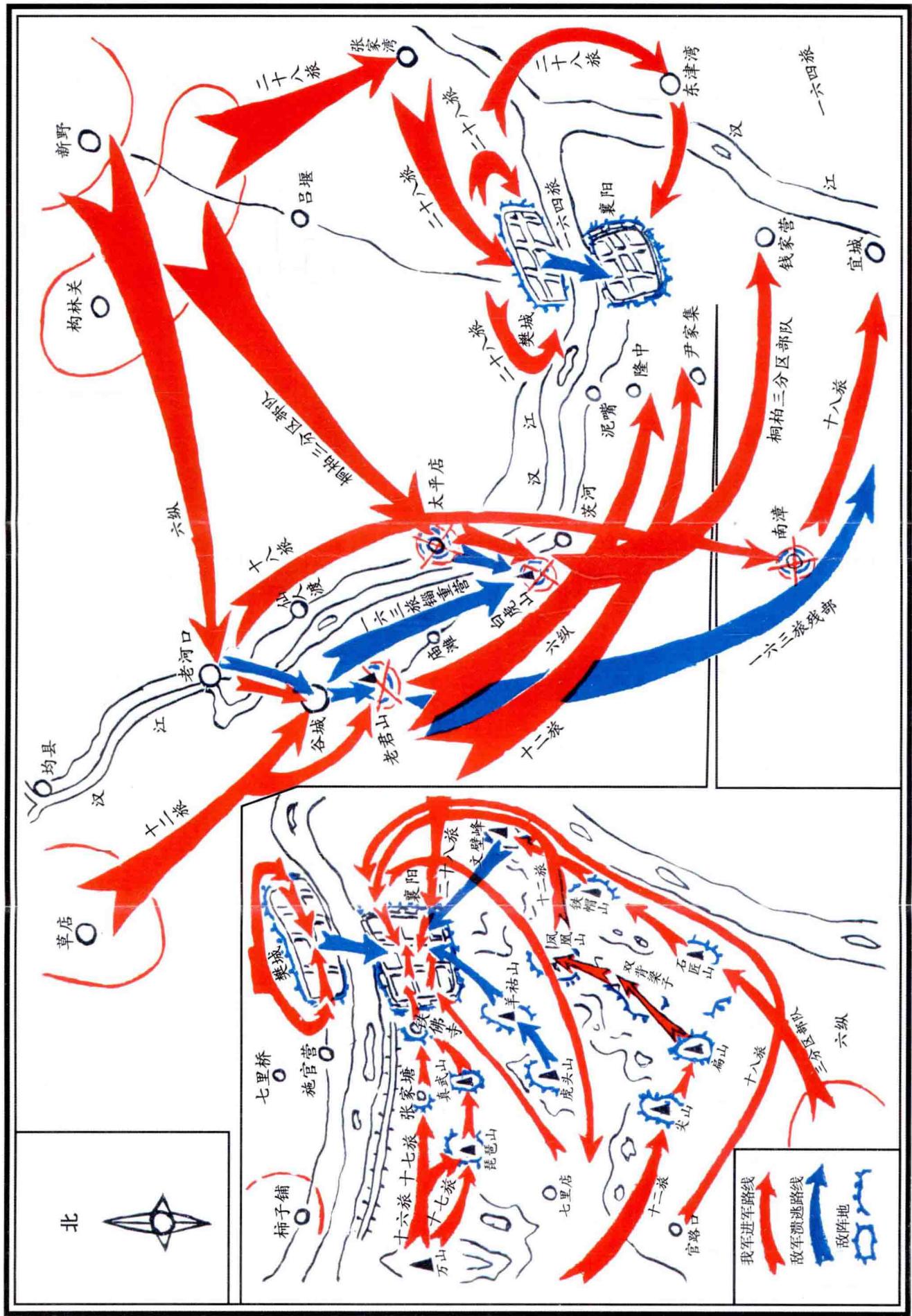
捉康泽授奖旗。

左下图：人民解放军指挥员，
水上观察敌情，指挥作战我军解放
老河口、谷城后，即水陆并进，直
逼襄樊，右上图：汉水上的进军。



我缴获化学臼炮八门，此其四门。

冬日裏的樊役經歷過要摘要



前　　言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刘邓大军解放襄樊（今襄阳一编者著），这是襄阳地区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我党我军在建党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。

作为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，为什么一下子要选择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来写呢？一个原因：为自己的写作兴趣所驱使，这种兴趣，确实是自己一种天然乐趣。早在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就有意无意写了短篇小说、剧本和古诗。小说和剧本已无一字幸存。但古诗还记得一清二楚。以后入伍当兵，在宣传队里，所写舞台节目，随写随演。那便算是一种工作了。1976年写出了第一个电影剧本《锅炉车间》，受到过当时全国七家电影制片厂的一致青睐，不巧的是当时正处于毛泽东同志逝世，接着又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这之后，对于在“文革”中提倡的“三高”、“三突出”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作品，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，这个本子也就自然搁浅。但那以后，对于文学创作，便一发而不可收。写出来，没发表，叹惜一声，放到一边，瘾来了又写，就这么盲盲目目写下去。在写《襄樊战役》前，自己就问自己：这可是个重大题材，是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？几经琢磨，最后，还是个兴之所至，便不管

襄
樊
战
役

三七二十一，写出来再说，就这么开始动笔了。

小说初稿出来后，交到市委宣传部，宣传部的最终意见是：稿子还不错，有的章节写的很精彩。但还有些粗糙，等诸葛亮文化节之后，（当时我市第一个诸葛亮文化节即将召开。）慢慢再改一下。当时，我为了赶在文化节前出书，于是便没听宣传部的话，自个出版了。现在回过头来想：我当时的思想为什么糊涂到如此地步？如果不从唯心的角度去思考，只好用一个“笨”字来了结。

书出版后，我曾寄了几本给当年主攻西门的李德生同志，（他是襄樊战役主攻西门的指挥员）并请他转送给王宏坤、张廷发、肖永银、尤太忠等同志，请他们对此书提出意见。后来听说，他们对此书没什么意见，我认为，没什么意见，便是对此书的认同。作为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，写出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能得到这么多领导的认同。心里这种高兴之情是自不待言的。但回想起当年盲目出版的情形，既懊悔又自责，故现在借此再版的机会，我把写作中的一些体会在这里说明一下。

找准战役中的主导，将其定位为小说中的主人公。

在全国解放战争中，襄樊战役自然算不得大战役，但它的确有它的复杂性。参战的三支部队，虽说当时都归中原军区管辖，但各自的任务是不同的，为了夺取襄樊这样一个大目标而汇集到一起来了。这三支部队，哪一支是攻城的主要力量呢？这问题看似简单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整个小说也将是一本错误的小说。那么，我是怎么找的呢？刘伯承在襄樊战役取得胜利后的讲评中说：“在攻城中，王近山指挥和六纵

起主导作用。”根据这一讲评，便可以把王近山定位为本书的主人公，六纵在战役中的一切活动，便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。这样定，无论是当年参加过战役的部队、首长，还是现代评论家，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了。

以获奖部队为主体，夯实小说的历史性。

一场战役千军万马，人人都是用生命在投入。作为反映这场战役的小说，当然做不到人人都写，每支部队等量俱到。那么，哪些写？哪些不写？哪些重点写？哪些次点写？这在动笔之前必须分理清楚。记得有人写出“战襄阳”的初稿时，就有人说：襄阳又不是哪一个人打下来的。这就说明是一个主次问题没分清、轻重没摆平出现的问题。我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分的呢？襄樊战役胜利后，部队开了庆功会，受表彰和奖励的单位有：主攻破城的十七旅被授予一等功；“刀劈三关”的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“襄阳特功团”；突破西门的四十九团一营被授予“襄阳登城第一营”；十八旅五十四团二营活捉康泽，立特等功；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缴获化学炮立特等功。这些获奖的部队在整个战役中，无疑都是战功卓著，成绩显著的部队，要写这场战役的小说，理所当然的应该去写他们、歌颂他们了。从这些获奖的部队中，又可看出十七旅最为突出，是“刀劈三关，直取西门”这一作战计划的主攻部队，就用这支部队在战役中一步步所取得的胜利，作为小说发展的主要脉络，再配以捉康泽、缴获化学炮为重要情节，这样，小说的全部框架便形成了，这种框架，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搭建的，有据可依，有史可查，小说的历史性就勿用质疑地夯得牢牢实实的了。

大胆设想，增强小说的可读性。

一本好的描写现代战争的历史小说，其历史性和可读性必须兼而有之。历史性应放在第一位，这是勿容质疑的。但是偏废了可读性，那就会离读者太远，也就失去了宣传人民、教育人民的意义了。《襄樊战役》为了赢得更多、更广大的读者，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大量的加工。比如西门桥，那是攻城的必由之路，破坏和保护西门桥，便成了敌我双方关注的重点。在“破坏”和“保护”这对矛盾冲突中，我便大胆地放飞了艺术想象的翅膀，在我军塑造了雷正军，在敌方塑造了曹登科，让这两位神枪手，为“破坏”和“保护”西门桥，进行了精妙绝伦的比枪，为了展示两位神枪手的枪法不至出现得太突然，便又在事先设计了雷正军在宋村打野鸡、曹登科在南漳打白鸽的情节，为他们在西门桥比武作了些铺垫，当情节发展到二人同时在西门桥相遇时，便有一种出人意料之外，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感觉，当两人展现出那种令人惊叹枪法时，就把人的感情调动到巅峰，不由得会叫人拍案叫绝了。又如武侠小说比较能吸引人，在战争题材的小说里，构思一些武打场面，也是十分融洽的，于是，便在十六旅里塑造了侦察科长韩雁南，敌方塑造了武功高强的黄定坤，为了显示二人高强的武功，以及避免情节发展的突兀、单调，我方又塑造了梅小武，敌方又塑造了王彪、李豹，作为陪衬，中间还塑造了个柏义，在其间穿针引线，情节发展层层深入而又合情合理，当几个人在纷纷乱军之中相遇时，一场别开生面的武打，也便水到渠成，叫人鼓掌喝采了。

把握尺度，掌握好对上层人物及重大事件的加工整理。

还是我正在写襄樊战役的时候，有人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写邓小平刘伯承，他们怎么说怎么说，还要你来设计叫他们怎么说吗？”我一听，也笑着回答：“是呀，是由我来设计呀！”这虽然是一句笑言，也确实问得好，引起了我的警觉。我在写邓小平、刘伯承的过程中，是十分小心谨慎的。比如康泽，这是一个从骨子里仇视共产党的人物。早在他搞复兴社就流传这样一首歌曲：“大哉中华，代出贤能，历经变幻，均能复兴，蒋公中正，今日救星，我们跟他，前进前进，复兴复兴。”这首歌相传是出自康泽之手。当邓小平在向王近山、王宏坤、刘金轩等人介绍康泽的情况时，按理说应该是用得上的——能说明康泽的反动性。但我考虑到这首歌在当时就是“相传”出自康泽之手，而不是“肯定”。而邓小平又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政治家，对于这种不实的“相传”的说法，用在他口里说出来好不好呢？并且这段歌词的严肃性也似乎欠佳？我考虑再三，决定宁可少一点，不可出问题，终究没用上去。又如白崇禧曲线救襄阳一段，当时康泽被共军打的向白崇禧频频告急，白崇禧派兵驰援襄阳，“但只听到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，他的行军速度慢得象乌龟一样”（董益三语）为什么这么慢？是不是他有意拖延时间？这是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的，虽说敌人可以丑化，如康泽的志大才疏，胡学熙的粗率急躁，那必定是艺术加工，现在要在事实上对这位国民党的上层人物“有意栽赃”，这又妥不妥呢？我也是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，最后觉得：既是小说，哪能事事都必须精确呢？丑化敌人也没有哪儿定个什么标准，于是，便大胆把他说成是“有意”，就把这章像现在这模样定了下来。